

The Urban Culture Studies Reader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第三卷

薛毅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The Urban Culture Studies Reader



第三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 录

第一辑 空间与政治

- 《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 戴维·哈维 / 3
- 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亨利·列斐伏尔 / 24
- 空间 亨利·列斐伏尔 / 34
- 对空间政治的反思 亨利·列斐伏尔 / 50
- 全景敞视主义 福 柯 / 65
- 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 戴维·哈维 / 92

第二辑 中产阶级文化

- 中产阶级及其世界 约翰斯梅尔 / 139
- 政治与心理: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
..... 卡尔·休克斯 / 169
- 布尔乔亚的恶梦 罗伯特·M.福格尔森 / 189

第三辑 后现代主义

-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249

贯穿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弹性积累:对美国

城市中“后现代主义”的反思 戴维·哈维 /303

从神话到神秘 理查德·勒翰 /326

可能的城市世界 戴维·哈维 /349

徐如己同空 第一集

2 \ 革命·解放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革命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革命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革命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解放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中文理论空中 第二集

18 \ 革命理论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义主升则司 第三集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18 \ 革命理论 革命理论教育意义及其

第一辑

空间与政治

《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

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至少可以追溯到1492年,要不然就更早。同样,很长时间以来,这一现象及其政治经济影响是人们讨论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848年之前的情形作出了热情洋溢而且全面的分析。他们总结,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斗争,才能征服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破坏力量,建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在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里实现其自身的需要、要求和欲望。

然而,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那些话的革命时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幸运的是,《宣言》的作者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历史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1952,8)在1872年德文版的前言中写道:“正如《宣言》中所说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评论说,尽管没有权利去改变已经成为重要历史文献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权利并且有义务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地理条件对它进行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意义。他们问道:“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72)

当然,对我们这些身处同样令人烦扰却又不是革命性时期的、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情感的人们来说,《宣言》中的某些段落似乎有些古

* 选自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怪、过时,或者说完全会让人反对。但是,《宣言》的绝大部分是那样深刻、清晰有力,以致其当代相关性令人震惊。

比如说,某些为人熟知的段落依然击中了当代异化和感性的核心,特别是在过去20年间它们一直在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时代中发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44)

难道这不是极其准确地描述了那些令人震惊的力量吗?这些力量腐蚀了当代教育、政治、社会事务和道德情操,以至于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个人自恋和自我异化的方式来反抗它们。我们不是经常被包围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吗?再看看这个: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资料,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5—46)

这些段落中的修辞力量、阐述的确定性、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随

后在最著名的一个浮士德比喻中,将它比作一个“魔法师,他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条件下释放出来的无边力量的爱恨交织情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宣言》还警告我们周期性地动摇社会根基的危机的必然性。这些危机具有创造性的破坏,其特点呈现为一种“荒谬性”:无数迫切却又无法满足的社会需要中的生产过剩、充裕之中的极度缺乏、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先前创造的生产力——资产阶级试图以此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所造成的周期性破坏。我们知道巨大的科技变革完全改变了地球的表面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48])。但是,同样是这些表面上看来有魔力的力量却造成了失业,使投资缩减,并对甚至是资产阶级都很珍惜的生活方式造成破坏。那么,资产阶级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些危机呢?

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50)

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时时、处处在扩大,在深化。

敏锐的地理学家立即会察觉到这一论点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维度。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定位(spatial fixes)”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既然《宣言》详细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如何既创造又毁灭它自己活动的地理基础(生态的、空间的和文化的),并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一个世界,那么对其空间和地理维度进一步详细审查就很值得。这就是我在这里想要集中讨论的主要矛盾,尽管不久就会发现把《宣言》中的任何一个主题与其他主题分隔开来既不可行也不适宜。

1. 空间维度

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不断地转向我在其他地方(Harvey, 1982)称为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多数明显表现为在一特殊地理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进行“空间定位”的过程,再加上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我们有必要深刻理解其特点。在今天,这些区别比过去更加重要了,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处理《宣言》的优点和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把这个问题概念化也同样值得详细审视,因为正是在这里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其代表来自许多国家——开始联合起来,试图确定一个能够在极为显著的地理和文化差异中实现共同革命议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研究不平衡地理发展和空间定位问题的方法略微有点矛盾。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地理重构的潜在结果往往会迷失于下列这样一种修辞模式中,即最后总是把时间和历史凌驾于空间和地理之上来考虑。

《宣言》的开场白就把讨论定位在欧洲,而且其论题主要陈述的正是那种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这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各国共产党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丹麦文和英文一样,都是此文献拟定出版的语言)为了拟定工人阶级的纲领而集会伦敦。所以说,这个文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不是国际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使资产阶级掌权的革命性变革与“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以及对殖民地、东印度及中国市场的贸易直接相关。从一开始,资产阶级的兴起就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及策略密切相关。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 42—43)

资产阶级通过这些地理学手段采取迂回战术，从外部破坏、从内部推翻以地方为限(place-bound)的封建势力。通过这些手段，资产阶级还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自己野心的执行机构(44)。而且，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凭借着内外部的地理转型来继续追求他们自己的革命使命。在内部，大城市的创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同时使前者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并迫使农民成为附属的阶级)。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当交通和通讯系统、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城市基础设施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时，“自然力”就必须服从于人的统治了。

但是随后发生的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的集中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建立像工联这样的机构来阐述他们的主张(53—55)。此外，现代通讯系统的发展把“不同地方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不同阶级之间的全国性斗争”。当这个过程穿越边界发展时，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统一的资本法则(58)。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以反映资本行为的方式在空间中集中和分散(见下文)。

马克思在一个段落中详述了这一观点，这个段落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而不是以它应该得到的那种关注来阅读和思考：

不断扩大新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

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6—47)

如果这不是对我们现在所知的“全球化”的令人信服的描述,那么就很难想象“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补充了一些东西: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7)

资产阶级“教化使命”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虽然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但这段话也暗示,地理扩张的力量存在着某种界限,它不能无限制永久性地发挥作用。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2. 空间定位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很突兀地来阐述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诉诸了一个长期的分析传统。特别是,他们似乎大大依赖于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解读,从这个文本的灵感中吸收优缺点。

黑格尔(1967,148—152,278)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于“成熟的”市民社会所固有的严重紧迫的内在矛盾来说是潜在的解决办法。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另一边则是深陷于痛苦和绝望中的“贫穷的下层人民”的形成,这就为社会动荡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这些动荡和战争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内部变革(如财富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就能解决的。市民社会由此被它的“内部辩证法”“所驱动而超出自身范围,并向外部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过度生产的物资,或者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它还必须要发现殖民地,并因此批准它的一部分人口“在新的土地上回复到家庭原则”。它还用这种方法“为其工业提供了一种新的需求和领域”。所有这些都有一种“对利润的极度渴望”所激励,并不可避免地包含风险,所以工业“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这明显预示着《宣言》中的某些辞令。

在一些令人吃惊的简短段落中,黑格尔简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可能解决不断增强的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但他却相当不可思议地中断了这个话题。这使我们仍然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否能够通过短期或长期地诉诸某种“空间定位”而得以稳定。相反,他却把注意力转向了作为伦理观念的实在的国家概念。可以认为,这暗示了现代国家超越市民社会内部矛盾——一场内部转型——既是可能的又是值得的。但黑格尔却没有解释他认识到的贫穷问题和日益增长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如何被克服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帝国主义能够解决这些特殊问题?答案是模棱两可的。正如阿维纳里(Avineri,1972,

132)所指出的,“这是黑格尔唯一一次在他的体系中提出问题——但却没有给予解答”。看起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即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法存在于某个福地或地平线之外的其他空间。

黑格尔到底如何深远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注意力,这个问题可以无限制地辩论下去。恩格斯自然相信“只有马克思能够承担起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汲取精髓的工作,这个精髓包含了黑格尔的真正发现”(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以描述资本积累一般法则的语言与黑格尔的非常相似。《法哲学原理》(Hegel, 1967, 150)写道:

“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而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就产生了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它使贫困积累成为与财富积累相对应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却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99)”

这两个文本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甚至可以把《资本论》第1卷理解为由许多历史的和具体的证据支持的一场结构严谨的论证,证明黑格尔偶尔提出的命题虽然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或能提供证据的支撑,但却无疑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绘的内部矛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将不会有任何的内部解决方案。如果放任自流,不加抑制,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衰竭而终,并最终毁掉它自己财富的两个来源——劳动力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不但试图强加给黑格尔哲学而且试图强加给其他每个人的结论。

但为了使这种论证更加有力,他还不得不重提某种空间定位的问题——某个其他空间中的乌托邦解决方案——这是黑格尔提出来却没有给予解答的问题。

这样看来,《资本论》中论证结构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中谈到了殖民问题。乍一看,它似乎是一种多余的追述,以补充前一章中对《宣言》的一种修辞性追忆,通过这种追忆宣告,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但是从黑格尔的论点来看,本章还具有特殊意义。马克思试图通过资产阶级在殖民地中所鼓吹的政策来说明,资产阶级在资本的起源和本质方面是如何与它自己的神话相矛盾。在资产阶级的描述中(洛克就是典型的一例),资本(一个物)起源于对生产者自己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劳动力作为商品却是通过那些节俭和勤奋而制造剩余资本的人与那些不这么做的人之间自由缔结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马克思怒吼道:在殖民地中,“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只要劳动者能够“为自己而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关系。它依赖于“毁灭靠劳动挣得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剥夺劳动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剥夺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引用书籍、诗篇以及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同样的事实在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也有表述,如威克菲尔德对澳大利亚的评论,在那里,为了给资本主义剥削保存大量的雇用劳动力,私有财产和国家的权利被用来防止劳动者方便地进入自由土地。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在它的殖民地计划中被迫承认它在家乡试图掩盖的东西——即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把劳动从他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中强制性地分离开来为基础的。这就是资本“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的秘密。

这些事情与黑格尔没有给予答案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说明。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移居海外或移往某个边境地区从而回复到真正非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供给的控制就遭到了破坏。这样一种扩张的形式也许对劳动是有利的,但却不能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提供任何方法。马克思在后来

的文本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强烈的关注。他首先把两种殖民地类型区别开来:

第一,说的是本来意义上的殖民地,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殖民地。这里从事农业的大部分殖民者,虽然也从宗主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资本,但并不是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生产也不会是资本主义生产。这是在或大或小程度上自己从事劳动的农民,他们主要保证自身的生活……在第二种殖民地(种植园)中,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就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Marx, 1968, 302—30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Marx, 1976, 716)

被黑格尔视为至关重要的新兴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有通过重新创造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关系及占用他人劳动的相关权力才能实现。因此,首先,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根本条件重新出现了。马克思有关殖民问题的章节似乎排除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任何外部“空间定位”的可能性。马克思拒不承认殖民化(或通过任何空间定位进行扩展)会最终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行之法,他显然不得不关闭了黑格尔那还有些微敞的大门,并加强了对总体革命的号召。但是这扇门并不会一直是关闭的。黑格尔的“内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有着连续的表现,每一次表现时,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

解决这一问题都会被有理有据地重新提出来。有关殖民问题的这一章可能解决了《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唯一关注的生产问题。不过,当马克思表明生产要求与流通要求相冲突从而产生过度积累危机时,他在第3卷中又怎样做呢?两极分化呈现为这样的形式,“一极是闲置资金另一极是失业人口”(Marx, 1967, 第3卷, 251),随之的结果就是两者都被贬值了。这些危机的形成可以通过地理扩张和重构加以遏制吗?正如我在其他地方(Harvey, 1982)已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外贸和外部市场增长、生产资本的输出生以及随着其他地区原始积累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扩大等因素会在短期内遏制利润率的下降。但这个短期是多久呢?如果它延续许多代(如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所暗示的),那么它对马克思理论及其此时此刻在市民社会中心地带寻求革命变革的相关政治实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并且,如果工人也寻求他们自己的空间定位,那会怎么样?这样,马克思就不得不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长的一个信念,即通过向外移民而逃到某个福地就是解决其痛苦的方法。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富有影响的埃蒂耶拉·卡贝所领导的一个乌托邦派系——的公开信(马林所引用, 1984)中不仅坚持任何新的社会组织基础必须存在于某地,存在于欧洲,而且认为任何逃到乌托邦王国(不存在的地方——伊加利亚)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他指出,这些移民将“很容易受到其教育中的错误和当今社会的偏见所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不能够在伊加利亚中被根除”。内在的分歧很容易被敌对的、异己的外部力量所利用。而且,因为劳动分工和环境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落在工人身上的负担将需要一定程度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而这些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评论道,“如果不具有绝对排外和宗派的性质,几十万人不可能建立并维持一种公有的生活环境”。当然,最后证实这正是导致美国伊加利亚移民失败的难题(参见Johnson, 1974),因此马克思的结论就有了一些可信度:

对于认识到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自然也包括伊加利亚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过渡期,即个人财产慢